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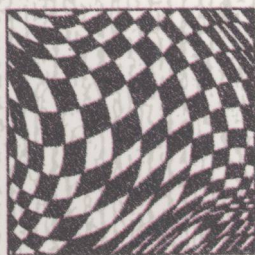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于伟 秦玉友

中国农村劳动力 教育培训与转移调查研究



JIAOYUBU
RENWEN
SHEHUI
KEXUE
ZHONGDIAN
YANJIU
JIDI
JIJIN
ZIZH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NENUP.COM

ZHONGGUO
NONGCUN
LAODONGLI
JIAOYU PEIXUN
YU
ZHUANYI
DIAOCHA YANJIU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中国农村劳动力 教育培训与转移调查研究

于 伟 秦玉友

ZHONGGUO NONGCUN LAODONGLI
JIAOYU PEIXUN YU ZHUANYI DIAOCHA YANJIU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转移调查研究/于伟,
秦玉友.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602 - 5458 - 6

I. 农… II. ①于… ②秦… III. ①农村-劳动力转移-
调查报告-中国 ②农民-技术培训-调查报告-中国
③乡村教育-调查报告-中国 IV. F323.6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645 号

☐责任编辑: 黄玉波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刘晓军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政编码: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87213

传真: 0431—85691969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科华印刷厂印装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27mm 印张: 17.75 字数: 290 千

定价: 2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
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系列研究成果

本书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NCET—07—0171)资助,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状况调查及其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K880058)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农村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及农村教育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02JAZJK880023)研究成果。

前 言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后，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壁垒逐渐消失。而“三农”问题并没有因为这种制度壁垒的消失而得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下更加引人注目。因此，“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对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进行全面谋划。

我们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有计划地转移一定比例的农民，缩小农业人口比例，改变农村的社会特质，发展小城镇。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提高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素质，使其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要，从事其他生产的农民也要接受必要的教育培训，从农村或农业中转移出来。要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素质，从农业或农村转移农民，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必须了解农民、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现有素质。农民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现有素质状况是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素质，促进农民向其他行业转移和对其进行培训的起点。已完成义务教育，又有接受再培训的经济学意义的主要是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因此，调查研究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和素质及对其开展培训的情况，有利于制定与当前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素质状况相适应的培训政策和农村人口流动政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这种宏观背景的把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我国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转移情况进行了调查。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1. 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素质调研；2. 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培训状况与培训需求调研；3. 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行业分布与行业适应调研；4. 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劳动状况与生活状况调研。研究人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和农民受教育程度排名，采取随机和

行业兼顾的方法进行取样,对浙江、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四川、安徽、贵州青壮年农民展开调研,到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四川、安徽、贵州等打工者集中的地区进行农民工调研。调研工具与相应数据的收集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内容:1. 问卷。调查对象为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2. 素质测试。测试对象为农村青壮年农民和农民工。3. 访谈、调查。调查对象为行政人员和对口单位工作人员,如教育局、农业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统计局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农广校、民办技工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4. 文献收集。主要是收集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统计报表等。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我国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受教育状况调查研究与咨询报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向教育部递交的咨询报告)、《加强农民工培训 提升农民工素质》等论文,在《光明日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被国内很多网站转载和同类研究引用。

本书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又一重要成果,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报告。这一部分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农村劳动力与农民工的概念,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经典理论,不同学科对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转移现状与问题和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转移比较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是专题报告。这一部分是关于农民工和农民教育培训与转移的专题报告。这些报告从农民工和农民教育培训与转移的现状及问题、原因、对策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是个案调查。这一部分主要展示了原生态的农民工和农民调查。

本调查研究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对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特别关心,多次为调查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副校长柳海民教授、社科处处长刘建军教授、教科院院长马云鹏教授也非常关心本调查,为本调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向史宁中校长、柳海民副校长、刘建军处长、马云鹏院长致以诚挚的感谢。本调查研究是在于伟教授全程组织,农村所全体专兼职研究人员,教科院部分教师、农村所和教科院部分研究生参与下完成的。在此,向参与本调查研究的

全体老师、同学，向支持我们调查的地方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郭静、齐倩楠、李丽、李迪等同学帮助校对了全书文稿，对她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本调查研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状况调查及其发展模式研究”和“农村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及农村教育体系研究”两个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调查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香港华夏基金、香港思源基金会资助，在此，对这些资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于伟 秦玉友

2007年9月26日

目 录

文献报告	1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及转移文献报告	1
调查报告	33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	33
上海、苏州农民工素质状况调查报告	43
北京市农民工时代特征之调查研究	57
广东省深圳市青壮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素质状况及培训策略调研报告 ...	67
辽宁、吉林两省农民工社会境况的问题调查与对策思考	85
河南、安徽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素质状况调查报告	98
四川、贵州两省农民工调研报告	108
山东省青壮年农民教育学历与培训需求调查报告	122
安徽、河南青壮年农民基本情况调研报告	137
辽宁、吉林农民受教育状况及其培训策略的调研报告	151
个案访谈	168
农民工个案访谈	168
农民个案访谈	220

文献报告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及转移文献报告^①

郭 静 齐倩楠 曲 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当前全党、全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教育培训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并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马侠著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李梦白等人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与对策》(1991)是较早的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文献,之后又陆续有农村劳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出现,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截至2007年9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数量可观的相关问题的文献,其中关于农村劳动力方面的1870篇,关于农民转移方面的209篇,关于农民工方面的4149篇。中国优秀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自1999年至2007年9月,共收录关于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优秀硕博论文76篇,关于农民工方面的优秀硕博论文176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自2000年至2007年9月,共收录关于农村劳动力方面的文章1783篇,关于农民转移方面的文章96篇,关于农民工方面的文章14586篇。除此之外,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是迄今为止关于农民工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调查研究成果。以上文献从各个视角介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教育培训的现状,揭示出在转移以及教育培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剖析原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与此同时,国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成功转移的案例及理论成果也为我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解

^① 本文献报告由秦玉友老师提出文献综述框架与写作思路,郭静负责完成了初稿,后经齐倩楠、曲昕补充、修改和校对。齐倩楠、曲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下面将对目前国内外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教育培训的文献进行简要梳理,以期给予今后的研究一定的启示。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目前,很多学者在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之前都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历史进行了梳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体上经历了“转移高潮——禁止流动——再次高潮”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6年,农民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时期出现的农村人口大量迁移现象。曾邵阳、唐晓腾(2004)认为,造成此次流动的原因可分外在和内在两种,外在原因是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导致人们无法在原居住地较好地生存,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了生存资源紧缺。而张利萍(2006)主要从五个方面对该阶段的流动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统治阶级的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二是革命阶级的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三是知识阶层的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四是民族工商业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五是手工业教育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近代工业的流动。

第二阶段是1958年到1978年,在此期间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由于对上一阶段农民的大规模流动没有进行有序的规划,1956年我国的就业、粮食供应、住宅、交通等城市问题已显得相当突出,为了解决执政以来首次面临的社会难题,特别是吃饭这个大问题,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9年1月9日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1963年,以公民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为判断依据,公安部把公民所持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类型。1975年,修正的《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法条。197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执行《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确立了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小市迁往大市的控制原则。就这样,随着一系列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和稳固,城乡壁垒坚不可摧。(曾邵阳、唐晓腾,2004)

第三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再次农民流动高潮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自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政治制度背景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国家开始调整和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对进入中小城市的限制开始放松。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落户。1993年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开始酝酿。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限制进一步放宽。随着《“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的提出，我国掀起了新的城市化浪潮，中等规模的城市逐渐放开口口限制，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2004年12月，国务院要求废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一隐性问题也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入城市。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凭借外资的注入，得到迅速发展。工业企业的大量增加，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于是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来到广东、福建等地务工。再加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业比较收益开始下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劳动力的过剩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相交合，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新一轮“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改革进程加快，从而掀起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高潮。这时，乡镇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大发展，各种开发区建设出现热潮，非国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自此，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从宏观经济环境分析，1991年至1995年，我国进入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高峰期，随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期。应该说，至此，虽然农民大量地向城市流动，但是此时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流动还能够基本保持平衡。可从1997年一直到现在，出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多，而且到城市就业难、生活难等多重问题。但即使在进城打工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的农民不断涌入城市。（曾邵阳、唐晓腾，2004）。陆学艺（2004）也认为，在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一样，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概括起来讲，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改变职业（即离土不离乡）、改变居住地（即进城镇或到其他发达地区务工——离土离乡）和改变户口身份三个阶段。

自1985年开始,我国人口流动、迁移总量逐年增加,尤其是非户籍流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85年至1990年期间,平均每年省际迁移量达221.3万人,省内迁移量为460.5万人;1985年以来,我国非户籍自发迁移格外活跃,城市暂住人口作为非户籍迁移中的特殊类型,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例如,据1988年10月20日调查,上海市1988年的流动人口数上升到131万,广州市流动人口1987年突破100万大关,1988年高峰值增至130万。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群,流动人口数接近500万之众。1989年春季时又出现‘百万民工下珠江’的浪潮。”(李梦白等,1991)从农村流出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向珠江三角洲,这就是第一次“民工潮”。根据估算,1992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达3500多万,而1993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估计为5000万至6000万人。1992年至1996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4122万人,平均每年转移824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0.7%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个百分点。两个转移“高潮”的十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近9700万人,1978年以来8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这十年实现的。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从1997年至2000年,调查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8.1%上升至23.64%。据此推算,同期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数由8315万人增长到1134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008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10.9%。(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

二、农村劳动力与农民工概念界定

农村劳动力是指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农村,16岁以上,60岁以下,以从事农业(指大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为主的劳动力。虽然他们最基本的特征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但也具有从事非农生产的权利(刘殿成,2001)。“农民工”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概念,始于社会学。1983年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最早提出“农民工”一词。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也出现了“农民工”一词。之后,陆续有农民工的研究文献出现。1991年,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工制个人的规定》(1991年国务院87号令)中,将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进城农民从业形式的多样化,“农民工”一词已经失去了“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含义。

目前,牛津大词典、汉英大词典、英汉大词典等大型词典里还没有“农

民工”一词的相应翻译。我国学者的一些文章中一般将其译做 peasant worker, 如张文显主编的《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二卷》(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写的《2005 年中国就业报告》中将其译做 rural migrant worker。

李培林(2003)认为, 农民工一般指户籍在农村, 户口为农业户口, 但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的“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 “工”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独特结合。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中也认为, 农民工既是一个职业概念, 也是一个身份概念。“农民”指其身份, “工”指其职业。他们持有农业户口, 户籍身份是农民, 在家承包集体的土地, 但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外出务工的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 而且包括在农村就地为他人从事有偿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谢建设在《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2005)一书中将农民工定义为“从农村来城镇的务工人员”, 王春光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将农民工界定为“拥有农业户口, 被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刘应杰在《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一书中将农民工定义为“身份上属于农民而已经从农民中分化出来, 主要从事工人职业, 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认为,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 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 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 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也包括在县域内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劳动力问题研究的经典理论

对于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产生了不少经典理论。颜升级(2006)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简单梳理。刘易斯创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即无限富余劳动力发展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对二元结构模型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 托达罗又补充了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 发展了二元经济配置理论。斯塔克提出了相对贫困假说, 对二元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发

展。同时,人口转移理论的发展也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雷文斯坦的转移规律、博格的推拉理论都对人口在地区间的转移动因作了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著作,但相关见解很多。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发生了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其次,社会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第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方式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描述道:“在工业国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中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爱尔兰,工业后备军则是从工程师、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中得到补充。”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向何处转移以及怎样转移,是由社会生产力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第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推进器”和“加速器”。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打破了农业生产的自给性,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固的农村市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 1954)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他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可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而现代工商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商业,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商业的产出和积累。随着积累的增加,现代工商业就有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由这种互动关系造成的良性循环,会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渡到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上来。(郭熙保, 1998)

在刘易斯两部结构发展模型的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修正和发

展了劳动力转移模型。他们认为刘易斯模型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应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拉尼斯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划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从农业部门转移出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并不会减少农业生产总量。在仅能维持农业人口生存下去的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不变的制度工资下，工业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而且，当农业劳动者流入工业部门时，农业产品剩余便产生了，农业产品和农民消费之差所得的农业剩余正好可以提供给流入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第二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变为大于零但仍低于不变制度工资。这时显性劳动力失业不复存在，但隐性劳动力失业仍然存在，劳动力继续流向城镇工业部门。由于这一阶段农业劳动者边际生产率为正数，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引起农业总产量的减少，粮食短缺以及粮食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进而决定了工业部门扩张，即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和速度呈上升趋势。第二阶段，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即隐蔽失业者已经被吸收殆尽，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已不再由习惯和道德力量决定，而由市场力量决定。此时，农业已经完全商业化，工业部门要吸收农业劳动力，必须付出高于不变制度工资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工资。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强调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该模型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它指出了工农业平衡增长在二元经济阶段的重要性，提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刘易斯模型和费—拉尼斯模型合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李德洸，2004）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民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这种决策依据包括两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这种差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悬殊，这是农民向城市非农产业移民的重要动力；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是托达罗模型一个重要的贡献，由此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会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作出移民的选择。移民

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只要在城市预期收入的现值比在农村大,作出移民的决定就是合理的。托达罗模型比刘易斯模型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其政策含义为:第一,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第二,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因此创造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第三,农村居民的学历越高,其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的失业;第四,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水利和交通运输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李德洗,2004)

迄今为止,在已经提出的对托达罗基本模型的修正中,哈里斯—托达罗(HT)模型较为突出,该模型试图把农村与城市部门分开,进而分析转移对农村和城市产量、收入与福利的影响。从HT模型中得出的一种假说是,较高的城市工资会导致较严重的城市失业。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移民流入城市部门。基本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假定,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决定的。根据这一假定,内生决定的市场结算工资将导致流向城市部门的移民人数减少,由此产生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的上升和其他现象可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并导致就业增长比产出增长低。修改后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意味着城市就业机会创造比率的提高会提高失业水平。若已知创造城市就业的不同手段(如部门工资补贴、创造或扩大市场需求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则可以根据HT模型,以产量收益或损失来衡量。该模型还表明,强行阻碍和限制劳动力的转移可能减少农业部门的净福利。(李德洗,2004)

作为对收入均等化理论的补充,伊斯特林(Easterlin)较早地借用相对贫困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在他看来,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所谓的“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根据一个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作出的评价,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决定的生存水平(Macunovich,1997)。根据这种假说来解释城乡之间的转移现象,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转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Stark and Taylor,1991)。斯塔克等人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来解释转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Stark and Taylor,1991)。他们假设人们转移

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因而感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会有转移动机。他们利用国际转移进行比较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经验证明,主要思路是:有些农户在村里感到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便愿意转移出去。但他们遇到一个改变参照系的问题,即他们一旦转移到城市,他们用以对比的收入水平就不再是其村里乡亲的,而是城市的生活标准。然而,如果选择一个在文化、地理上都十分生疏的地区转移的话,他们可以把自己和当地社区隔绝开来,而不改变参照系。因此,选择国际转移是一种避免改变参照系的农户策略。斯塔克等人通过观察农户对国内或国际转移的选择,检验了转移决定中的相对贫困假说。(李德洸,2004)

与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不同,乔根森从另一个独特的角度论述了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理论。他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 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因为人们对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当农产品生产已能满足人口需求时,农业的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2. 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相反,乔根森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经济陷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人口(劳动力)的增加,也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只有农业剩余的出现才为农业人口流向工业部门提供了充要条件。3. 农业剩余是指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即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增长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而且有一个生理最大量界限,经济的增长,则有不断进步的技术作为保障,因此,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也是必然的。4. 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不但工业部门为了吸引农业劳动力,要向农业劳动力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而且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工人的工资也不断上升。(李德洸,2004)

唐纳德·博格(D. J. 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人口转移“推一拉”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